

序 言

梅绍武

格雷厄姆·格林是当代负有盛名的英国小说家，他继承了把小说写成艺术品的优良传统。

他 1904 年生于英国中部伯克爱姆斯特德一个中学校长的家庭，青年时代曾装成一个流浪汉，靠手摇风琴赚些钱，漫游英国各地。1925 年他从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在《诺丁汉杂志》社无酬工作，1926 年起在伦敦《泰晤士报》任副总编四年。1929 年第一部小说《内心人》问世后，他就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开始创作生涯。

20 世纪 30 年代，他著述甚多，除为《观察家》杂志写电影评论外，发表了《行动之名》(1930)、《夜幕降临时的谣言》(1931)、《这是个战场》(1934)、《英国造就我》(1935)和《布赖顿硬糖》(1938)五部严肃小说以及三本他称之为“消遣”性的轻松小说：《斯坦布尔列车》(1932)、《一杆出售的枪》(1936)和《密探》(1939)，另外还写了访问利比里亚和墨西哥的旅行记《没有带地图的旅行》(1936)和《不法之路》(1939)。在这时期，格林同奥登和伊舍伍德等左翼作家步调一致，在作品中反映当时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如实描绘那充满虐政、暴力和不平静的欧洲情景，并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决。在艺术手法上，他摒弃了 20 年代盛行的唯美主义，在《英国造就我》一书里曾经试验过意识流技巧，但未获成功，后来就采取直爽、简洁而通俗的文体，运用惊险侦探小说的形式，不过格调又高于市面上流行的侦探小说。他利用这种

形式把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道德问题加以戏剧化,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而不自命高雅的风格,注意情节的安排,通过行动描写人物,有时还采用新闻报道和电影剪辑手法加强效果。格林曾在谈论电影时说:“你如果首先激动观众的心弦,就可以使他们接受你所想要描述的恐怖、苦难和真理。这依然是对的,而且对小说和电影都同样适用。”^①他虽在1926年皈依天主教,但由于他青年时代曾有四个星期是英共党员,在创作态度上同情贫困的下层社会和思想左倾的主人公,并未像他同辈信仰天主教的知识分子那样倒向政治上的右翼。

1904年,格林根据亲自调查的情况,写成一部描绘墨西哥当局驱逐教会、追捕神甫的小说,引起很大的重视,并获霍桑顿文学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从事外交工作,曾被派往西非、亚洲和拉丁美洲,因此战后他的小说大都涉及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1948年发表的《问题的核心》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更使他赢得国际声誉,接着,1950年写的《恋情的终结》又获天主教文学奖。1954年他被聘为《新共和》杂志的驻越南记者,回国后写成一部现在看来颇有远见、反对美国插手越南战争的小说——《沉静美国人》(1956)。随后发表的小说有《哈瓦那特派员》(1958)、《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1961)、《喜剧演员》(1966)和《随姨母旅行》(1969)。另外,他还写了《起居室》、《第三人》等戏剧和电影剧本。他于1962及1963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和英国皇家文学学会荣誉成员奖章。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担任过埃尔与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和鲍德莱·海德出版社的社长。

20世纪70年代,格林写了自传《一种生活》(1971)和两部小说《荣誉领事》(1973)及《人性的因素》(1978)。直至今日,他已经发表了三十多种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游记、短篇小说集和论文集,其中《问题的核心》、《喜剧演员》等十三部长篇小说和两篇短篇小说已被搬上银

^① 见《天主教世界》,1969年8月号,第218页。

幕。格林现在虽已年逾古稀，精力仍很旺盛，密切注视着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今年又长途跋涉去拉丁美洲国家访问，为他的下一部小说收集素材。

综观格林的作品，正如他本人所说，“大多是政治小说”，诸如《密探》涉及西班牙内战，《沉静的美人》描绘抗法战争时期的越南，《哈瓦那特派员》写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下的古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描述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撤退前的刚果，《喜剧演员》揭露海地前总统杜瓦利埃的暴政，而《人性的因素》又写的是国际间谍组织的阴谋活动。格林认为 20 世纪充满暴力、恐怖和残酷，因而他的作品里不断出现战争和革命、罪犯和警察、搜捕者和被追捕者，交织着正义和非正义、忠诚和背叛、信任和怀疑。

除去政治小说外，格林至今写过四部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布赖顿硬糖》、《权力与荣誉》、《问题的核心》和《恋情的终结》。不少西方评论家认为他受了法国天主教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影响，但格林对此加以否认，而且不愿意读者把他当做一名天主教作家那样看待。他 1966 年曾对《生活》杂志编辑说：“尽管宗教使我感兴趣，但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认为给予他重要影响的作家是福特·马道克斯·福特、约瑟夫·康拉德和亨利·詹姆斯，但又谦虚地说道：“若说詹姆斯影响了我，似嫌有点荒谬，正如说一座高山影响了一只耗子一样。”其实，在他的《权力与荣誉》出版后就有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他的写作水平已经使他名列当时健在的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和福克纳等优秀小说家的行列中而毫无愧色。

《权力与荣誉》和《问题的核心》是他反映宗教信仰的代表作，前一本小说向世俗心目中对于宗教神圣不可侵犯和神甫庄严身份的概念大胆提出挑战，出版后受到天主教宗教法庭的谴责。格林 1948 年在同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和 V.S. 普利契特通讯中谈到“我为什么写

作”这个问题时,承认他为了忠于自己的想象而使他陷入某种程度“不忠于”教会的境地,也就是说他在追求艺术目标时,不能考虑宗教教义的束缚而为教会利益进行宣传。^①同年,他在《问题的核心》一书中更进一步找到了表达他那种“不忠”的新方式。

《问题的核心》所叙述的故事颇为简单: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英属某西非殖民地^②的警察署副专员斯考比,原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送精神苦闷的妻子去南非度假,不得不向一名叙利亚奸商借债,从而受到他的威胁利诱;后来他又与一个因所乘船只被敌方潜水艇击沉而流落该地的年轻寡妇海伦发生关系,违反了教义,精神苦闷,最后为了解脱而自杀身亡。

这部小说出版后也引起了争议。英国评论家弗兰西斯·魏思达姆认为这是“对人生绝望的研究……是格林的一部杰作,因为他在其中充分发挥了那些贯穿在他所有小说中的主题:怜悯、恐惧、爱情和失望,以及一种对人的精神解脱的探索。”^③著名的英国天主教徒作家伊夫林·沃说:“这部小说提出了一个十分难以捉摸的问题。它的主人公说教会‘知道一切答案’,但他的生和死却又包含一个仅能在上帝那里得到解答的问题:完善的公正和完美的怜悯取得和谐一致。这部小说只有天主教徒才写得出来,也只有天主教徒才能理解,我的意思是只有天主教徒才能理解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性质……对他们来说,这部十分虔诚的书会像是一桩丑闻,因为它不仅把天主教徒描绘得不像正常的人,而且展示他们在经受自己的信仰的折磨。这部小说会成为争论的对象,甚至遭到谴责。成千上万不信教的人会怀着单纯的激动心情

① 见伊丽莎白·鲍温、格雷厄姆·格林和 V.S.普利契特:《我为什么写作?》(波西威尔·马沙尔出版社,1948年)。

② 西方评论家认为是当时的黄金海岸。

③ 弗兰西斯·魏思达姆:《格雷厄姆·格林》(朗曼斯出版社,1958年),第20—21页。

阅读它,一点也不会觉察到自己正闯入信仰的最神秘的深处。另有一类人会看出这部书的含义,却又由于怀疑其中宗教信仰是否得当而感到困惑。”^①另一名英国知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则认为:“小说里那样迷信罪人会洗涤罪孽,似乎显得轻薄而无意义,也许隐藏着对信仰的削弱,因为人们若真相信地狱,就不会在它的边缘那样装腔作势地表现出感恩的态度。更扼要地说,它试图在人性情欲上覆上一层宗教揣测的色彩,从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荒谬。”^②

这里不妨就格林本人的创作意图来试着简单剖析一下这部作品。格林在创作上有个独特之处,就是有意识地在每本小说中反复运用一两个关键词汇来表达中心主题思想,例如《密探》里是“信任和怀疑”,《这是个战场》里是“公正”,《权力与荣誉》里是“纵情放任”,《恋情的终结》里是“爱和恨”。读者在阅读《问题的核心》时,不难发现关键词汇是“怜悯和责任”。

主人公斯考比在为妻子去南非筹款而踌躇为难时,作者对他的心理状态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无疑表明对斯考比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致命的弱点是他对妻子的怜悯和所承担的责任,一种比爱更强烈的激情促使他向叙利亚奸商借钱,从而受到后者的威胁利诱,逐渐走向犯罪的道路。

正当他送走妻子,如释重负,心情恢复宁静时,他又遇到一批难民,并跟其中的一个年轻寡妇发生了恋情,作者把这也归因于斯考比的悲天悯人和责任感:

……仿佛是,他卸掉了一个职责,只是为了再担起另外的一个。这

① 见《公益》杂志,1948年7月16日一期。

② 见《乔治·奥威尔的论文、报刊文章和书信全集》(赛克尔与瓦尔堡出版社,1968年),第440页。

个职责是要他同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但是这并不能给他些许安慰，因为有时候他感到，认识到这一职责的只有他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底细，室内的灯光会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印象，正像在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给人一种遥远、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一样。但是，他不禁自己问自己说：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斯考比后来对海伦的关系，作者是这样描绘的：“怜悯像是他心头上的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知道热情会泯灭，爱情会消失，但是怜悯却永远停留在那里，无论什么也不能使怜悯消减。生活的条件培养着它。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不需要怜悯——那就是他自己。”

斯考比妻子回来后，他内心受到宗教的压力，但是对妻子和情人却又都怀有爱情，对他来说，专爱一个则会给另一个增添痛苦，矛盾重重，无法排解，最后领悟到：“他本来认为爱同相互了解是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知道没有谁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爱本是一种想了解别人的愿望，只是因为不断失败，这种愿望很快就死亡了，爱或者也随着死去，或者变成了痛苦的情谊，变成忠贞、怜悯……”

后来，斯考比明知奸商要杀害那个知悉他的私情、伺候他十五年的黑仆人，却未加阻拦，因此陷入更深的罪恶里：为了解脱自己而进一步犯下教义不可饶恕的重罪——自杀，让上帝去怜悯他的妻子、情人和其他的人吧，自己心甘情愿地堕入地狱。

作者反复强调主人公的沉沦是由于“怜悯和责任感”，以突出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格林在全书结尾借兰克神甫之口道出了自己对宗教的看法：教会对人生来的堕落也无能为力加以挽救，教会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西方评论家对格林这类有关天主教的小说议论纷纭,格林为此做出自己的解释:“我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走向地狱的书《布赖顿硬糖》,另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升向天堂的书《权力与荣誉》,现在只不过又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走向炼狱的书(指《问题的核心》)。我不明白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①

确实,格林这类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是不检点的天主教徒或酗酒的神甫,在光怪陆离的社会中难免受到诱惑,违背教义而犯罪。格林通过对他们的信仰、罪恶、赎罪和解脱等问题的探讨,主要关心的显然仍是人世间的灵与肉、善与恶的斗争。他写上帝,写罪恶,目的之一仍在于揭示西方社会中肮脏和腐败的现象。美国文艺评论家乔治·伍德考克说:“从理论上讲,格林或许承认原罪,但是他的作品里,人内在的恶,若与那种由于社会纷乱的活动而引起的外在的恶相比,则总是少一些。他对人性的力量的观察,促使他采取一种革命性态度。”^②

有的西方读者说:“打开格林的一本小说就会甘冒闻到一股硫磺气味的危险。”^③罪恶到处泛滥,恶挫败善,主人公多半是一些精神萎靡或苦闷的人,彷徨在爱与恨、善与恶、天堂与地狱之间。这一点格林自己承认是由于受到早期阅读玛乔丽·鲍温的一本历史小说《米兰的毒蛇》的强烈的影响:“鲍温使我有自己的基调——宗教也许会以其他方式向我解释,但是这种基调已经存在——恶在人间畅行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間漫步。”^④

格林在《问题的核心》里运用了电影剪辑手法,这是这本书的一个

① 见《天主教世界》杂志,1969年8月号,第220页。

② 见《读者指南》第1卷(美国勃克出版公司,1974年),第463页。

③ 见《当代作家》第15—16卷(加尔研究公司,1966年),第182页。

④ 见《巴黎评论》第3期(1953年8月)所载马丁·舒特沃斯和西蒙·拉温的《小说的艺术:格雷厄姆·格林》一文。

特点。另外他还发挥了他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在叙述的段落里经常掺入作者的议论。当代不少西方评论家反对小说中加进作者自己的议论，格林对这种偏见持不同意见，他坚持“一个小说家发发议论，表达自己的见解，是一种传统的、必不可少的权利”。^①作者本人的议论确实是格林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比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运用得更巧妙、更自然。他的方法是，不直接议论，而是从小说人物的思想和处境出发，展开作者的议论或引用生动的隐喻，使得读者几乎觉察不到这种转换，而把这作为表达人物意识的一个环节接受下来。这种加进作者议论的创作方法目前在我国也是个争论点，如何把它运用得恰如其分，似可从格林的创作中得到启发。

《问题的核心》虽被西方公认为是格林的一部佳作，但正如奥威尔指出来的那样，也存在着一一些不足之处。小说的背景为什么要选定在非洲？除了那个叙利亚商人外，整个故事情节完全可能发生在伦敦近郊。非洲人仅作为陪衬偶尔出现，斯考比脑子里实际上会闪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而殖民主义者对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制，在小说中竟未被提及。故事发生在1942年，斯考比却好像很少关心战争和本职工作，只是忙于一些琐碎事情，最关心的仿佛只是自己走向地狱的过程。格林对自己这本著作也不尽满意：“我觉得基调太低沉了，情节夸张，斯考比由于宗教原因而感到的忧虑不安也显得太极端了。”^②

读者读完这部具有古典传统的悲剧性小说，会觉得作者的人生哲学未免过于悲观失望，但是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字里行间还是迸发出一些劝人勿作恶的道德火花。

① 见大卫·洛奇：《格雷厄姆·格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23页。

② 见《格雷厄姆·格林的三部小说》前言（斯德哥尔摩，诺斯泰德出版社，1962年），第25页。

格林的政治小说《沉静的美国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被译成中文,现在再译介他的一部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位知名的英国作家的了解。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转眼,当年为《问题的核心》中译本写序距今已近二十年。

格雷厄姆·格林已于 1991 年 4 月 3 日病逝于瑞士一家医院,享年八十六岁。

20 世纪 80 年代,他还曾写了几部小说。1980 年发表的讽刺小说《炸弹宴会》写的是瑞士日内瓦城一位百万富翁费希尔“博士”经常举办别出心裁的豪华宴会,来宾均是阔佬名流;每次宴会,他照例先把他们恣意戏弄羞辱一通,然后再赠给每人一份厚礼。最后一次,他设下“炸弹宴会”,客人们须冒“被炸身亡”的危险,方能得到两百万法郎的巨额犒赏。于是,一群阔男富女进退维谷,演出了一幕丑态百出的喜剧。作品以精妙的构思、明快的笔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阔佬冷酷无情和贪得无厌的本质。西方评论家迈克·毛肖说这部小说所涉及的主题包括失望、孤独、自杀、死亡和对宗教信仰的困惑,而且可以把它看成是格林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在他小说中阐述的各种主题的一个缩影。

1982 年,他发表了一部探讨宗教和左翼思想的喜剧性小说《吉河

德大主教》。1989年，他八十四岁高龄时又写成一部描绘政治阴谋和思索爱的方式的小说《上尉和敌人》，主人公“上尉”是个毒品走私贩，又是巴拿马总统和将军组成的政权的朋友，最后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那样走向死亡。

格林在他去世的前两个月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最后的话和其他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汇集了1972年出版的《格林短篇小说集》未收的一些篇什，佳作颇多。

在长达六十六年的创作生涯中，格林共出版了六十一部作品，包括长、短篇小说，回忆录，游记，传记和剧本等，总销量达两千多万册。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情节生动，描写细致，语言幽默简洁，推崇他为当代的一位文学大师，但是尽管他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却因为他的某些观点不合瑞典评委会的心意而落选。

今年，美国兰登书屋现代文库编辑部组织知名学者和作家评选“本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于最近揭晓，格林的《问题的核心》入选，名列第四十位，跟以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榜首的其他九十九部小说一起被认为是“本世纪最有价值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补记

第一卷

第一部

第一章

—

威尔逊坐在贝德弗尔德旅馆的阳台上，裸露出来的白里泛红的膝盖顶着铁栏杆。这是一个星期日，大教堂的钟声丁丁当地响着，招呼人们去做晨祷。在邦德街对着旅馆的一边，穿着深蓝色运动罩衫的年轻的黑人姑娘们坐在中学临街的窗边，正在进行一项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想个法子把她们的金属线般刚硬的头发卷起来。威尔逊捋着他前不久才蓄起来的上须，一边等着自己要的杜松子酒，一边梦想着。

他对着邦德街坐着，脸侧向一边，望着大海。从他的白皙的皮肤可以看出，他从大海那边来到这个港口该是多么新近的事，他对街对面的女学生缺乏兴趣同样也说明这一点。他好像晴雨计上的一只落在后面的指针，在它的同伴早已移向“风暴”之后，自己却仍然指着“晴朗”。阳台下面的街道上，一些黑人职员正上教堂去，但是他们的穿着鲜艳夺目的湛蓝和鲜红色盛装的妻子们一点也没有引起威尔逊的兴趣。阳台上，除了一个留着大胡子、裹着头巾、向威尔逊招揽给他算命的印度人以外，就只有威尔逊一个人；这不是白人到旅馆来的时刻，他们现在都在五英里外的海滩上，但是威尔逊还没有汽车。他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孤寂。中学校两边的铁皮屋顶都向大海一边倾斜着，当一只秃

鹭落下来，威尔逊头顶上的波纹铁皮就发出一阵哐啷哐啷的响声。

从停泊在港口的一支商船队里走下三个高级船员，沿着码头踱了过来，立刻有一群戴着学生帽的小男孩把他们围住。小孩们像唱儿歌似的反复喊着一句话，隐隐约约地传进威尔逊的耳朵里：“船长要跳基格舞？我姐姐漂亮的中学女教员。船长要跳基格舞？”大胡子印度人望着写在信封背面的几个计算式紧皱着眉头——是星占的公式还是计算花销的数字？当威尔逊低头再向大街望去的时候，几个船员已经从孩子们的包围中冲杀出来了，可是，这群小学生又把一个没有结伴的水手簇拥起来。他们像打了胜仗似的领着他向警察局附近的一家妓院走去，好像是在送他去托儿所。

一个黑人仆役拿来了威尔逊要的杜松子酒，威尔逊一口一口地慢慢呷着，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除非回到他那间肮脏、闷热的房间里去读小说——或者读一首诗。威尔逊很喜欢诗，但是他只是暗地里啜饮着，仿佛在服一剂什么药水。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总是随身带着《黄金诗库》；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饮一口朗费罗，再喝一口麦考莱和曼甘^①：“继续诉说吧，如何才华虚掷，被出卖的友情，爱情中遭尽戏弄……”威尔逊欣赏的是浪漫主义的诗篇。为了装点门面，他手边总有一本沃利斯^②的作品。他热切地希望自己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蓄着胡须就像系着某一个俱乐部的领结一样——这是表示他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好的标志，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泄露了秘密——一双棕色的小狗似的眼睛，一只塞特种猎犬的眼睛，这双眼睛这时正忧郁地凝视着邦德街。

“对不起，”一个声音说，“你是威尔逊吗？”

① 亨利·华兹渥斯·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乔治·白并顿·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杰姆斯·克拉伦斯·曼甘(1803—1849)，爱尔兰诗人。

② 埃德加·沃利斯(1875—1932)，英国通俗小说家。

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中年人。他穿着人人必穿的咔叽短裤,生着干草颜色的长脸。

“是的,我就是。”

“我能坐在你这张桌子上吗?我是哈里斯。”

“欢迎你,哈里斯先生。”

“你是非洲联合公司新派来的会计吗?”

“是的。喝一杯酒吧?”

“我想喝一杯柠檬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中午我不能喝酒。”

印度人从他的桌子边站起来,满怀敬意地走过来说:“您会记得我的,哈里斯先生。也许您愿意同您的朋友讲讲我的才能,哈里斯先生。也许您这位朋友愿意看看我的这些介绍信……”一沓肮脏的信封从来不离他的手,“都是来自社会名流。”

“走开。快滚,你这老骗子手。”哈里斯说。

“你怎么会知道我姓什么?”威尔逊问。

“在一份电报上看到的。我是电报检查员,”哈里斯说,“这个鬼工作!这个鬼地方!”

“我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哈里斯先生,您已经交了好运了。如果您肯同我一起到洗澡间里待一小会儿……”

“滚开,甘加丁^①。”

“为什么要到洗澡间?”威尔逊问。

“他总是在那里给人算命。我想也许那是唯一没人打扰的地方。我从来没想到问他这个。”

“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吗?”

① “甘加丁”原系英国作家吉卜林一首叙事诗的题目,描写一个在驻印度英军中服务的名叫甘加丁的印度挑水夫的故事。现在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常用这个名字称呼任何一个不知姓名的东方人。

“待了他妈的十八个月了。”

“很快就该回家了吧？”

哈里斯越过铁皮屋顶凝望着大海。他说：“船去的方向都不对头。但是只要我一回到老家，你就再也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了。”他把声音压低，一边喝柠檬汁一边恶狠狠地说，“我恨透了这个地方。恨透了这里的人。恨透了这些讨厌的黑鬼。不许这么叫他们，你知道。”

“我的用人似乎还过得去。”

“谁的用人都过得去。那些人是真正的黑人。可是这些人，你看，你看下边那个戴羽毛披巾的人，他们连真正的黑人也算不上，都是些西印度群岛人，海岸一带都被他们霸占了。商店的职员也好，市议员也好，文职官员也好，律师也好——我的上帝。内地的保护倒没有什么。对于真正的黑人我没有什么意见。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肤色。可是这些人——噢，我的上帝！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局害怕他们。你看看下边那个人，”哈里斯说，“看看斯考比。”

一只秃鹫扇动着翅膀，在铁皮屋顶上走动了两步；威尔逊的目光投向斯考比。他顺着这个陌生人的指点，不怎么感兴趣地望过去，他觉得这个单独地走在邦德街上的身材粗矮、头发灰白的人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时刻之一：记忆已被刻上一个小小的伤疤，只要几种事情同时出现，这伤口就要发疼——中午的杜松子酒味、阳台下的花香、波纹铁皮屋顶的丁当响声，一只丑陋的大鸟拍着翅膀移到另一个栖息的地方。

“他非常喜欢他们，”哈里斯说，“他还跟黑人睡觉呢。”

“那是警察制服吗？”

“是。我们的警察大军多么伟大！‘失去了他们就永远无法找到’——知道这句诗吗？”

“我不读诗。”威尔逊说。他的目光随着斯考比在这条沉浸在阳光